

## 「中国企業のイノベーション可能性構築のゆくえ」 呉曉波（浙江大学）

谢谢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非常高兴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昨天的报告，我听了以后也很有感触，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讲中国的和谐恐怕更应该看中国的底层，中国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的问题。昨天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以后，我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很简单，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我们讲和谐，但是还得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多说，那肯定是一个竞争的世界。那么，在竞争当中寻求我们的和谐靠什么？我们得想一想。昨天 Jack Hou 教授提到了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等在中国思想界讨论比较热烈的这些流派，特别是在经济学界。但是除了这些热闹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其实我们得看到中国的发展正处于迅速的建设期中。我想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应该知道，促进中国这 30 年成就的力量，促进它迅速发展的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一些人，是什么人呢？我想，应该是“建设主义学派”。是一群在那边拼命的干活、疯狂地工作的人，有这么一批人在那边疯狂的工作，在建设着这个国家。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情形。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像西方人喜欢叫的 Technocrats，就是我们讲技术官僚或者讲技术流派，他们在那边拼命地工作。有点像日本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一个迅速的追赶过程当中。不管如前面所讲的什么主义或什么派，其实中国所面临的最最大的问题就是摆脱贫困，追赶发达国家，这是很典型的。

讲到中国的增长，经济学家喜欢讲消费，讲投资。但是除了讲消费讲投资以外还有什么呢？新古典经济学派最典型的会讲这些，讲生产要素，如何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其实在生产要素同等的情况下又如何实现迅速的发展和追赶呢？我想除此之外其实还有这么个东西，就是我们内生的东西。内生的东西是怎么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又是个问题。我们讲和谐，和谐的基础是什么？

我简单讲我自己的一个体会，首先，我们应该从经济体系来看问题，必须丰衣足食，当国民都非

常贫困的时候，这个和谐又如何谈起。当然，我们更不要忘记掉我们的社会体系、我们的社会理性和社会价值观怎么样。在中国，社会理性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差，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和谐？实际的基础在哪里？另外，和谐的机会是均等的吗？大家都会讲机会均等的问题，关心各个群体、各个利益群体在社会当中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不是均等的？机会似乎是均等的，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获取机会的能力呢？是均等的吗？讲到获取机会的能力，其实我自己感受很深，我前面去过两次印度，感受很深。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当我们去那些社会底层，特别是去贫民窟去看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在同样的机会底下，人们获取这样机会的能力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社会的不和谐、社会阶层的分化，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因为腐败，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人们的能力是很不一样的。这个现实我们不得不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技术背景的人。其实，我是本科学电气工程的，做了 5 年工程师。当时，文革以后第一批进大学，最流行的就是要学工程，因为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后来看了一本很重要的书《来自竞争的繁荣》，那本书是德国战后，西德，当时叫西德，德国战后的第一任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写的那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看了以后我就想我要学管理，我就从工程转向经济管理。那本书关于竞争有关论述对我影响非常大。而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能力非常重要。所以要围绕这样一个关于能力的核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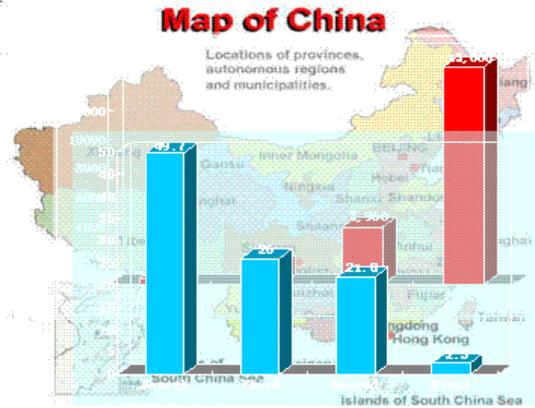
今天的发言时间很紧张。我讲的内容的基本的要点即，我们一定要讲能力的问题。如果没有能力，各位讲的其他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关于和谐发展的东西就是奢谈。而能力的建设在中国必须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代人付出了很辛勤的劳动、努力。我在这里作一个简单回顾，中国大陆从 49 年以来，能力是如何构制起来的？它有不同的阶段性，不同的阶段性里面都有很多的冲突，冲突是怎样解决的？时间很紧张，我这里就很快的过一过。近年的发展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中

国的 GDP 从 80 年以后到现在，中国的增长速度快了很多，很多人常常以此为自豪。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少？我们也得想一想。中国人均 GDP 的高速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情景。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会有很多的不同问题。特别是中国技术能力的积累问题，以我个人的一套研究视角和方法。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二次创新”，这是指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这个方面，我有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主要引用了西方学者 Utterback 教授的研究。很快的把能力建设的阶段过一下：从苏联援建到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全球化。我简单地做个小结，中国的工业能力的发展早期受益于苏联的援建，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当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用计划经济，用政府的强烈的推动，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一切以计划为主。当时苏联援建中国 156 个关键的项目，非常重要，其中 150 个项目获得了真正成功。当时有 3000 多名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进行指导。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可以说现代工业的基础。在这一个阶段，典型的特点就是模仿，我们在模仿中学习、成长。第二个阶段，中国跟苏联闹翻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我们的自力更生，消化吸收苏联遗留的技术。通过反求工程来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在不断提高产能的工艺上下了很大功夫。由此奠定了我们中国自主的工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基本的创新模式还是通过模仿和改进，属劳动要素有偏这种创新。这是在封闭环境中的技术自立。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首先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发展非常之迅速。随着对外开放，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这个时期主要为“市场需求拉动下的技术引进”。与前一时期政府主导性的模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面有创造性模仿，改进性创新。典型的做法是“市场换技术”。而市场换给别人，技术似乎并没有拿进来。这里面有巨大的矛盾，事实并非如我们所愿。我们致力于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追赶。在追赶当中市场换给别人，技术是不是拿到？并不见得。所以随后我们进入到新世纪以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典型的在更加开放环境下的发展。开始提出自主创新，还是要靠自主。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进行自主的创新，又有很多的做法。从东部的开放、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到中部的崛起，从国家

战略上都有不同的做法。FDI 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之大。昨天 Jack Hou 教授讲得很对，其中，来自于台湾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中国的工业企业的创新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我们从一些指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中国现在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在世界工厂当中，我们的自主创新到底有多少？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可以说从先进到落后拉了一条很长的链。先进的已经建立了全球研发网络，开放性创新逐渐形成。但是从落后的方面看也很严重。从存在矛盾方面来看，现代知识产权的矛盾，这种不和谐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强。美国政府有一个 337 条款的调查，专门针对知识产权的问题对中国开展调查。从 86 年开始有第一个案件，到现在，案件数急剧上升。在它全球的 337 条款调查中，关于中国的比例上升得非常快，最高的时候差不多一半的案件都是针对中国。所以在这个追赶进程中的建立创新能力方面的和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国在这几十年当中主要是在学习和追赶。在这种学习和追赶，我认为我们中国真正成长的主要动力。从日本、从韩国早期的经验，我们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从一个后来者怎么成长成一个紧跟者，似乎还试图想成为一个领先者。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大部分的企业其实还是处在后来者的位置上，少数企业成为紧跟者，真正的领先者不多。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危机。

关于未来，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展望。目前可以看得到的，现在国家对科技的投入迅速的加大，对创新的支持非常强有力，但是中外的知识产权纠纷还在不断地增加。所以，讲到和谐社会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技术发展的能力建设相关的问题会成为目前和谐社会建设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后面的讲稿中的东西我就不再展开讲了。全球化在目前是一个非常快的趋势，将帮助中国走向一个更加创新的、高附加值的发展阶段。如以一个企业为例，宝钢。它从日本全套引进技术后的成长过程就很典型。所以，和谐的世界是我们面临的机遇。

这张膜片是请大家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中国有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北京、上海、深圳，它们的人均 GDP 是这样一种分布；第二世界是东部沿海，然后是中部地区，再后是西部地区。



这个是人均 GDP 的分布。但是按人口的分布，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经济分布情形，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平衡发展，有发展梯度的地方。也说明它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拥有稳定、和谐的环境，增长，再增长 15 年，20 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国增长的潜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谢谢大家！

○座長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次にルー・ディン先生、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テーマは、「調和ある地域開発：挑戦と選択」です。

### 「調和ある地域開発：挑戦と選択」 ルー・ディン（フレーザーバレー大学）

谢谢主席先生！很高兴有机会来向大家汇报我的一些的研究的心得。我的今天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的和谐问题。大家都知道，吴教授讲中国有四个世界，区域的发展是很不均衡的。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非常高速，但是区域之间的收入格差呈现一个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和谐的课题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我的研究主要研究是看区域收入格差演化的趋势还有格差的原因，以及一些政策的选项。如果看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话可以看到，东部跟西部地区的收入差异是在扩大之中。

那么最近十多年以来，97-07 年数据来看，这个实线是从最低的贵州到最高的上海，这样一个排列，这样一个收入的差别，黑色的实线是 1997 年的情况，白色的点是 2007 年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格局没有什么变化，这么这个红线是一个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人均产出来讲，2007 年对 1997 年比例是 232%，它的均值增加了那么多，另外它的离散系数也就是用来衡量区域之间的格差程度的一个系数，这个是增加了 108%。但是这里面如果分别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来看，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差异格差扩大的是比较明显，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格差扩大的就比较不那么多，所以主要区域之间的差异是来自农村居民的差异。然后让我们把人均地区的产出系数，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系数跟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系数加以对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条是农村的差异系数，把 2007 年的情况和 1997 年相比，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改善。接下来稍微讲一下理论分析。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讲，如果在技术条件一样的情况